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的 关键词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的“最大公约数”

□ 马一凡

“最大公约数”是一个数学概念，指两个或多个整数共有约数中最大的一个。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强调的“最大公约数”，基本含义是不同个体、国家、地区之间的共同目标、共同利益、共同价值的最大化。全面准确地理解这些重要论述有助于我们在“存异”的客观条件下主动“求同”，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奋斗。

2012年12月7日至11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广东考察工作时强调，把最大公约数找出来，在改革开放上形成聚焦，做事就能事半功倍。2013年11月12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十八届三中全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强调，现在党内外对深化改革思想认识上有较大差异，但越是思想认识不统一就越要善于寻求最大公约数。2013年12月31日，习近平总书记在政协新年茶话会上强调，寻求最大公约数，凝聚改革共识，汇聚改革正能量。改革开放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发展史上的一次伟大革命，基于对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把握、对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实践的总结、对时代潮流的洞察、对人民群众期盼和需要的体悟，我们党认识到，只有实行改革开放才能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使国家强盛、人民富裕。当前，改革已经进入攻坚期和深水区，需要统一思想、达成将改革开放进行到底的共识，以开放促改革，以更大的政治勇气和智慧推进全面深化改革。

2013年12月30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十八届中央政治局第十二次集体学习时强调，中国梦意味着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价值体认和价值追求，意味着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意味着每一个人都能在为中国梦的

奋斗中实现自己的梦想，意味着中华民族团结奋斗的最大公约数。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是中华民族近代以来最伟大的梦想。中国梦凝聚了几代中国人民的夙愿，是每一个中华儿女对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的美好梦想是相通的，不仅造福中国人民，同时造福世界人民。空谈误国、实干兴邦，为了实现伟大梦想，需要一代又一代中国人民团结奋斗，需要共产党人团结全体中华儿女共同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2014年5月4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北大师生座谈会上强调，确立反映全国各族人民共同认同的价值观“最大公约数”，使全体人民同心同德、团结奋进，关乎国家前途命运，关乎人民幸福安康。价值观影响每个人的生活目标和判断选择，各族人民共同认同的价值观决定国家和社会的发展方向。要积极培育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增进各民族对伟大祖国、中华民族、中华文化、中国共产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同，形成全国各族人民最大的价值观念认同，促进各民族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

2015年9月22日，习近平总书记

在华盛顿州当地政府和美国友好团体联合欢迎宴会上强调，要合作就要照顾彼此利益和关切，寻求合作最大公约数。2016年9月27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十八届中央政治局第三十五次集体学习时强调，要继续向国际社会阐释我们关于推动全球治理体系变革的理念，坚持要合作而不要对抗，要双赢、多赢、共赢而不要单赢，不断寻求最大公约数、扩大合作面，引导各方形成共识，加强协调合作，共同推动全球治理体系变革。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正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展开，全球发展的深层次矛盾突出且复杂多变，人类社会的挑战前所未有。但是和平、发展、合作、共赢是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世界各国要想在冲突、矛盾中发展并获得利益，必须找到各国利益的最大契合点，通过开展对话、互诉诉求、搭建平台，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寻求共同目标，以共同目标促进共同发展。

2014年9月21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成立65周年大会上强调，找到全社会意愿和要求的最大公约数，是人民民主的真谛。2015年5月18日至20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统战工作会议上强调，要尽可能通过耐心细致的工作找到最大公约数。2017年10月18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强调，统一战线是

党的事业取得胜利的重要法宝，必须长期坚持。要高举爱国主义、社会主义旗帜，牢牢把握大团结大联合的主题，坚持一致性和多样性统一，找到最大公约数，画出最大同心圆。建立最广泛的统一战线，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不仅是党百年来的宝贵经验，也是其完成历史使命的战略和策略。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通过建立包括全民族绝大多数人口的最广泛的统一战线，取得了革命的胜利。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通过建立统一战线团结了包含知识分子、民族资产阶级、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的各族各界人士共同参加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统一战线的范围和规模进一步扩大，充分调动了各族各界人士共同参加经济建设和改革开放。新时代以来，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实践中，形成了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做好新时代党的统一战线工作的重要思想，通过统一战线巩固共同思想基础、广泛凝聚共识、汇聚力量。人民政协是最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组织，具有组织上的广泛代表性和政治上的巨大包容性。发挥人民政协在建立统一战线中的独特优势要始终坚持党的领导，引导各方人士紧紧团结在党的周围，用共同目标凝聚人心和力量，实现全体人民最广泛的团结，通

过细致的工作巩固已有共识、形成新的共识，坚持一致性和多样性的统一，发扬民主、包容和尊重差异。

2016年8月17日，习近平总书记在推进“一带一路”建设工作座谈会上强调，抓住发展这个最大公约数，不仅造福中国人民，更造福沿线各国人民。2020年9月4日，习近平总书记在2020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全球服务贸易峰会上的致辞中强调，积极寻求发展利益最大公约数。2023年10月18日，习近平总书记在第三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开幕式上发表主旨演讲强调，共建“一带一路”坚持共商共建共享，跨越不同文明、文化、社会制度、发展阶段差异，开辟了各国交往的新路径，搭建起国际合作的新框架，汇集着人类共同发展的最大公约数。发展是一个国家利益的根本所在，是一个国家的人民是否幸福的决定因素，共同发展是全世界人民共同利益所在。要把发展置于全世界发展的宏观政策的突出位置，在发展中着力解决国家间和各国内部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世界上的各个国家只有致力于构建和平的国际环境，抓住合作的机遇，通过交往的新路径、合作的新框架才能在大变局中实现自身的发展，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

2017年11月17日，习近平总书记同巴拿马总统巴雷拉举行会谈时强调，人类命运共同体汇聚着世界各国人民对和平、发展、繁荣向往的最大公约数。2021年10月25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50周年纪念会议上强调，形成共建美好世界的最大公约数。随着世界历史潮流的发展，经济全球化的程度不断加深、人类交往的广泛深入，各国之间紧密的依存关系前所未有。在人类追求幸福的道路上，一个国家、一个民族都不能少。人类命运共同体汇聚了人类共同利益，反映了各国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追求，符合世界人民对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共同期待，是解决人类重大问题，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世界的战略选择，为人类共同发展开辟了广阔的前景。

2021年7月5日，习近平总书记同法国总统马克龙、德国总理默克尔举行视频峰会时强调，中欧本着相互尊重、求同存异原则开展合作，双方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汇聚了彼此之间最大公约数。2022年2月16日，习近平总书记同法国总统马克龙通电话时强调，中欧双方应该共同努力，凝聚最大公约数，推动中欧关系得到新发展。2022年11月4日，习近平书记会见德国总理朔尔茨时强调，双方要始终从战略高度把握两国关系大方向，以建设性态度追求最大公约数。中欧双边合作具有全球性与战略性，追求双方最大公约数不仅为中欧关系发展指明了方向，也为积极发展全球伙伴关系，推进大国协调合作指明了方向。坚持互相尊重、求同存异、扩大互利、共赢合作，才能使中欧双方处理好分歧、扩大共识，推动中欧关系新发展，为建设新型大国关系做好示范和引领。

『第二个结合』是对中华文明

发展规律的深刻把握

□ 杜运辉

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指出，“第二个结合”是对中华文明发展规律的深刻把握。怎样理解这一深刻论断？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五个“突出特性”，蕴含着中华文明生生不息的重要规律。

第一，创新性 with 连续性相统一的发展规律。中华民族有着“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的创新精神，这种强大的文化创造力贯穿于生生不息、源远流长的历史连续性之中，“述”与“作”、传承与发展、守正与创新有机统一。中华文明既一脉相承而又革故鼎新、既坚守根本又不断与时俱进。中华文明创新性 with 连续性相统一的深厚基础，在于中华先民很早就探索维持生态平衡、保持社会稳定、安顿自我生命之道，农业经济、基层治理、中央集权、儒学教化等社会子系统之间保持动态平衡，这使得中华文明虽历经波折而具有强大的自我修复能力。

第二，统一性 with 包容性相统一的发展规律。中华文明是“天人合一”“天下有道”条件下的生产累积型文明形态，“定于一”的安定和平是劳动人民安身立命、繁衍生息的基本前提，坚强统一的国家是各族人民的命运所系。中华民族既奉行“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

的和平交往之道，又赞扬“微管仲，吾其披发左衽矣”的民族大义，崇尚“百姓亲睦”“黄发垂髫，并怡然自乐”的理想社会，形成“国土不可分、国家不可乱、民族不可散、文明不可断的共同信念”。中华民族有着多元一体的融合过程，丰富多样的自然环境和生产生活方式孕育了“和实生物”“和而不同”“殊途同归”“厚德载物”“上善若水”等先进文化理念，形成中华文明对世界文明兼收并蓄的开放胸怀。中华文明的统一性与包容性相辅相成，自强不息的刚健品德和厚德载物的宽容精神相得益彰。

第三，在创新中掌握思想和文化主动的发展规律。历史主动权或自由权是中华民族掌握命运、创造历史之根本。从历史上来看，中华民族具有对外来文化的强大汲取、融通力量，能够扬弃异域文明成果而有更高水平的自主创新，从而保持文化主体性。近代以来，中华文明在与西方文明的较量中暂时处于被动地位，西方中心主义文明观影响甚巨。但是，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人民在“两个结合”中打开了思想解放的空间，“具体的马克思主义”“活的马克思主义”使中国人民在精神上由被动转入主动。

为什么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能够从根本上改变中国命运、成为创造新文明的伟大力量呢？这是因为马克思主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国化时代化马克思主义的“魂”和“根”，二者的融通创新奠定了中华民族新世界观和方法论的理论基础。马克思主义揭示了人类社会的基本运动规律和资本主义社会的特殊运动规律，指出了扬弃资本主义文明、创造“保证社会劳动生产力极高度发展的同时又保证每个生产者个人最全面的发展”的“生产者自由平等的联合体”的正确方向。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层的精神追求，代表着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标识，凝聚着改造自然、维系稳定的深邃智慧，既具有鲜明的时代性和民族性，又具有相对的恒久性和普遍性。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都追问和解决“人之所以为人”或“从动物的生存条件进入真正人的生存条件”的根本问题，在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人与社会的关系、人与自我的关系等基本问题上有着高度的契合点。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进行革命、建设、改革的具体实践中，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结合、融通而互相成就。

一方面，我们用马克思主义激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富有生命力的优秀因子并赋予新的时代内涵，比如“阴阳造化”“道法自然”的天道思想、“民为邦本”“仁者爱人”的人文关怀、“实事求是”的求真精神、“一阴一阳之谓道”“相反相成”的辩证思维、“文明以止”“天人合一”的生态智慧、“协和万邦”“以德服人”的天下思想、“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民族精神等，都在新时代的伟大实践中实现了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成为中国式现代化的有机成分。

另一方面，我们将中华民族的伟大精神和丰富智慧更深层地注入马克思

主义。儒释道的“成人”思想丰富了“每个人自由而全面发展”的内涵，“道在器中”“理在事中”的辩证思维丰富了矛盾的普遍性与特殊性相统一的实践辩证法。历史表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现代化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乃是一体之两面，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形态、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核心内涵。

中国共产党既是马克思主义的忠诚信奉者、坚定实践者，又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忠实传承者和弘扬者，其根本原因就在于其人民至上的基本立场和为人民解放而探求真理的大无畏精神。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充分肯定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普遍意义和现实价值，揭示了中华文明批判继承、综合创造、守正创新的方法论，彻底超越了近代以来贬低乃至否定中华文化的民族自卑和西方自大的两种极端心态；论证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契合、结合、互相结合的基本规律，彻底超越了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马克思主义二元对立、非此即彼的形而上学思维方式；论证了历史传统、文化积淀、基本国情对现代化道路的重要作用，“打破了‘现代化=西方化’的迷思，展现了现代化的另一幅图景”，打开了人类前途的多样性可能空间。这些原创性贡献，在多个维度实现了五四运动以来的又一次思想大解放。

创新是第一动力，坚持创新在我国现代化建设全局中的核心地位，关键是激发人才创新活力，让一切文化创造源泉充分涌流。人类文明的进步，归根到底体现为“个人的自由发展”与“真正的共同体”（“自由人联合体”）交互互动的发展过程，是由“人的依赖关系”到“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再到“建立在个人全面发展和他们共同的社会生产力的基础上自由个性”的演进。只有把马克思主义思想精髓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精华贯通起来，才能最大限度地促进每个个体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才能保证“自由个性”“全面的能力”与中华民族共同体、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协调发展。人类自由和解放，意味着“人和自然界之间、人和人之间的矛盾的真正解决”，意味着人与自然之和谐、个人与社会之和谐、个人与自身之和谐。在汲取和转化人类一切文明成果的基础上，创造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的全人类共同价值，坚持把中国发展进步的命运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正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在五千多年中华文明深厚基础上开辟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意义和根本目的。

（作者系北京语言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中国文化综合创新研究中心主任）



（上接1版）2022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扩大内需战略规划纲要（2022—2035年）》，采取了一系列扩大内需的政策措施，效果逐渐显现，内需不断回暖，2023年经济呈现出回升向好态势，但基础还不牢，需要进一步巩固和增强。消费在内需中的占比越来越高，在拉动经济增长中发挥着基础性作用，要把恢复和扩大消费摆在优先位置。要不断增强消费的能力，改善消费的环境，扩展消费的渠道，提升消费的意愿，稳定和扩大传统消费，培育壮大新型消费，积极培育智能家居、文旅旅游、体育赛事、国货“潮品”等新的消费增长点，充分释放消费潜力。更好发挥投资对于扩大内需的关键作用，扩大有效益的投资。要处理好政府投资与社会投资的挤出效应，也有溢出效应，在社会预期偏弱的时候，政府投资对于树立信心有特殊重要的作用，要通过政府投资和政策激励有效带动全社会投资。

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紧迫任务是，通过科技创新加快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提升供给体系对需求升级的动态适配性，以及增强产业链供应链的韧性和安全性。要继续把发展经济的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扎实推进新型工业化，推动制造业绿色化、数字化转型，加快建设制造强国，创造制造业新的竞争优势，夯实现代化产业体系的基础。系统布局 and 推进信息基础设施、融合基础设施、创新基础设施等新型基础设施建设，为实现高质量发展提供重要战略支撑。打造生物制造、商业航天、低空经济等战略性新兴产业，开辟量子、生命科学等未来产业新赛道，加快传统产业转型升级。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特别提出，要以颠覆性技术和前沿技术催生新产业、新模式、新动能，发展新质生产力。新质生产力与传统生产力相比最大的不同在于，它是能全面体现新发展理念的生产力，是能有效推动高质量发展的生产力，是能不断开辟发展新领域新赛道、不断塑造发展新动能新优势的生产力。新质生产力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提供了方向，也是检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否到位的重要标准。

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供需是要循环起来的，并在循环中不断推动经济发展跃上新台阶、取得新突破。习近平总书记2020年4月在中央财经委员会第七次会议上提出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这是立足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统筹发展和安

全作出的战略决策，是把握未来发展主动权的战略部署。多年来的实践证明，我国作为一个超大规模经济体，内部循环的势能强大。统筹扩大内需和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性改革，打通影响二者相结合的断点堵点卡点，需要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的建设，不断释放国内大循环的势能，将其转化为高质量发展的效能。这是因为市场半径决定分工程度，分工程度决定效率高低。我国还存在一定程度的市场分割现象，而市场分割将会抑制分工，既不利于需求的释放，也不利于供给体系质量的提升。同时，要进一步发挥国际循环在促进供需结合中的作用，因为虽然国际循环现在面临着一些新的挑战，但在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更加美好世界的进程中，国际循环也面临着新的机遇，而且机遇大于挑战。

统筹扩大内需和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着力点

统筹扩大内需和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一项长期任务，需要坚持问题导向和系统观念，坚持稳中求进、以进促稳、先立后破，突出重点，把握关键。

一是加快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将“以科技创新引领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放在9项重点任务的首位，既凸显出要把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作为主线，也凸显出科技创新在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中的重要性。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基础研究和原始创新不断加强，但关键核心技术受制于人的局面没有得到根本性改变。因此，要坚持创新在我国现代化建设全局中的核心地位，加快推进创新型国家建设。决定创新的诸多因素中，人才是关键。我国接受高等教育的人口已超过2.4亿人，这是推动创新的底气所在。要优化人力资本配置，提高人力资本密度，既要在国家层面上形成世界重要人才中心和创新高地，也要结合各地产业状况，打造各具特色的区域性人才中心和创新高地，形成雁阵式创新格局。加快科技成果转化，提高科技创新对于现代产业发展的引领力。

二是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习近平总书记在2024年新年贺词中指出：“我们的目标很宏伟，也很朴素，归根到底就是让老百姓过上更好的日子。”因此，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新征程中，必须始终坚持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不断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

的向往。保障和改善民生，将会带来巨大的消费需求。就业是最基本的民生，扩大消费最根本的是促进就业，因此，要更加突出就业优先导向，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特别是要确保高校毕业生、退役军人、农民工等重点群体就业稳定，扩大中等收入群体规模。要织密扎牢社会保障网，健全分层分类的社会救助体系，兜住兜准兜牢民生底线。同时，民生领域也是投资的富矿。新时代新征程，人们对教育、养老、生态等高品质民生的需求更加强烈，这为扩大投资需求创造了难得机会，进而真正做到消费和投资相互促进。

三是深化供需领域改革。需求潜能的释放和供给体系质量的提升都还存在着一些体制机制障碍，需要深化改革。就需求领域的改革来说，很重要的一个方面是深入推进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加快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进程，特别是要推进公共资源按常住人口规模配置，使数以亿计的流动人口在城镇中能比较平等地享受基本公共服务，降低城市生活成本。这一方面有助于稳定和提升流动人口在常住地的消费能力和消费意愿，另一方面有助于打破限制劳动力流动的各种障碍，推动全国统一劳动力市场的形成。就供给领域的改革来说，要不断完善落实“两个毫不动摇”的体制机制，充分激发各类经营主体的内生动力和创新活力。特别是要为民营经济发展创造更加宽松更加公平的环境，在市场准入、要素获取、公平执法、权益保护等方面出台更具包容性和稳定性的举措。促进中小企业专精特新发展，更好孵化新质生产力，推动构建富有活力的创新链产业链供应链。

四是完善宏观调控。宏观政策在转方式、调结构、提质量、增效益上发挥着重要作用。要强化宏观政策逆周期和跨周期调节，在更长的时间跨度内统筹重大政策规划、重大工程项目、重大生产力布局，在有效需求不足、社会预期偏弱的背景下，有些规划、项目、布局可以提前落地，以稳定预期和扩大有效需求。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加强各种宏观政策工具的创新和协调配合，特别是要聚焦经济建设这一中心工作和高质量发展这一首要任务，增强宏观政策取向一致性，把非经济性政策纳入宏观政策取向一致性评估，防止“合成谬误”，强化政策统筹，确保同向发力、形成合力，放大政策组合效应。

（作者系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社会和生态文明教研部副主任）